论衡

心心念念者，无非“真我”

喻军

今年适逢明代奇人徐渭500年诞辰。徐渭一生坎坷，身后经袁宏道不遗余力地宣扬推崇而渐有热度。袁宏道所推崇的“性灵说”和徐渭主张的“真我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这也是袁宏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徐渭的内在原因。

不能不感佩浩瀚的文史上竟有那么一种隔代的缘分：在徐渭去世20余年后的某个夜晚，明末“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在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朋友陶望龄家中做客，无意中走到书架旁并顺手抽出一本诗文集，虽“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他只略读了数篇便如遇天人、惊骇不已，急忙叫来陶望龄，问是何人所作？陶望龄说这是同乡徐文长之作。袁宏道追问：“是今人还是古人？”得到的回答是作古多年了。随后二人凑在烛灯下，边读边啧啧称叹，读到特别会心处甚至大叫狂呼，全然不顾已是夜深，以至于家仆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相互打听所为何事？袁宏道叹道：“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这位独具慧眼的袁宏道，此后多方搜集徐渭遗稿加以研究，确信其乃不世出的奇才。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崇徐渭，使徐渭之名渐有热度，以至后来形成“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之势。就这样，徐渭在几乎被遗忘的边缘，由一腔古厚情怀的隔代知己袁宏道重新接引回人间。袁宏道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徐渭之后，在一封尺牍中写下这样的评价：“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字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

这段话提到“七子”，我以为有必要先简略介绍一下徐渭当时所处的文坛背景。

当时的文坛，因袭模拟之风盛行，但客观而言，袁宏道有所贬抑的“七子”，起初是作为文坛的进步力量出现的。明仁、宣以后，讲究气闲词雅、歌赞承平的“台阁体”流行，实际上内容十分空洞。后李东阳的茶陵派，崇尚格律的严谨，仍未脱台阁体窠臼。《明史》云：“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希图起衰振微、除荆辟塞的呼声渐起，于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掀起一场旨在改变“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习气的文学复古运动。这些才子几乎都是科场进士出身，受程朱理学浸染很深，使命炽热、风骨铮然，皆不满“台阁体”的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空同子集》(按：空同子即“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号)谓“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七才子之名播天下……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明史·李攀龙传》)。李东阳“卓然以复古自命”，主张“诗必盛唐、文必秦汉，非是者弗道”。但一味强调复古，注重模拟，似乎又形成一种理论“定式”和思维固化，这往往泯灭生机、难以化育出新气象。总的来说，前后七子虽有才华但创造力不足，有学问却跳不出程朱理学的藩篱。

晚明时代，虽只短短数十年，却是一个异彩纷呈的时代，如嵇文甫先生所说为“心宗盛行时代”(《晚明思想史论》)，也是诞生过许多好作家、好作品的时代。如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及袁宏道、归有光、陈继儒、王思任、张岱、李渔等人的所谓晚明小品。万历以后，随着阳明“心学”思潮兴起，重视自我心性的意识得以复苏，对于正统美学和宋明理学的“离经叛道”显而易见。徐渭、李贽、汤显祖、屠隆诸家，可谓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其中，“狂禅”运动核心人物、“童心说”发明者李贽，出于泰州学派颜山农、何心隐一系，他们的个性化特征已非儒家名教所能约束，故世人常以“狂徒”视之。其流波之所及，囊括晚明一大波文人艺术家。比如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创作主张的公安派(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特别是袁宏道，自24岁认识李贽开始，其注重自我表现的文风越发明显。可以说，其大体的承续乃禅学、老庄、王学及白苏，但直接受影响的，无疑还是李贽的“童心说”)、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都受其极深影响，都反对步趋模拟、泥古不化，强调心手相合以挣脱条教之繁为创作理论要素。但在“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之际，“文长、义仍(汤显祖)崭新有异”(《列朝诗集小传》)。

“王学”对徐渭的艺术思想、创作实践及人格特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比徐渭小六岁的李贽，其对徐渭的影响也不能排除，二人都有“狂”的一面，但这种影响尚属间接。此处不妨对徐渭的心学师承略作梳理，因为这一点实乃徐渭艺术思想及人格特质的内在脉络。在其晚年所作《畸谱》中，徐渭把一生所师事的人物列出五人，皆为“心学”人物。其中，活跃于当时者居三，即季本、王畿和唐顺之。

徐渭的老师季本，浙江会稽人，乃王阳明嫡传弟子。徐渭27岁纳入季本门墙，相见恨晚，故徐渭有“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之叹。从承续上看，徐渭应算作王阳明的再传弟子。王畿，也是浙江会稽人，曾直接师事王阳明，乃王门中成就最突出的弟子之一。他的学术自成体系，世称“龙溪学派”，与“泰州学派”的王艮并称于时。王畿是徐渭的远房表兄，但以问学论交，徐渭仍执弟子礼。在《畸谱》中，徐渭把王畿列为“师类”之首。至于二人间的交情，《徐渭集》中多有披露：《答龙溪师书》一札，系与王畿商讨诗歌创作之记录；《送王先生云迈全椒》一诗，则表现出徐渭为王畿送行时的惜别之情；《洗心亭》一诗下注“为龙溪老师赋池亭，望新建(新建伯，指王阳明)府碧霞池”，以写景寓徐渭对王阳明和王畿的景仰之情；《次王先生偈四首》下注“龙溪老师”，可见是与王畿的唱和之作；《继溪篇》下注“王龙溪子”，诗中“自家溪畔有波澜”，表达了徐渭对龙溪之学的高度肯定，“不用远寻濂洛水”则表明徐渭对理学教条的摒弃。唐顺之是“唐宋派”散文的代表作家，武进人，为“时文第一”的王鏊弟子，因师事王门弟子欧阳德而列入王门学系。他曾统兵平倭，属文武全才，更属思考型作家。论及唐宋文，他指出文章之法即“神明之变化”，为文者须是“神解者”且“心地超然”、“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便为“绝好文字”。嘉靖壬子(1552)夏天，唐顺之过会稽，王畿、季本尽地主之谊，当时徐渭也在场，写下了《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到柯亭而别，赋此》诗，记录了这次聚会，并自此开始了和唐顺之的密切交往。唐顺之对徐渭十分欣赏，徐渭晚年在回忆和唐顺之关系时说：“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举以自鸣者。”

徐渭师事五人中，稍不活跃的，则为徐渭的表姐夫萧鸣凤和钱楩。

《明史》称萧鸣凤“少从王守仁游”，以学行闻名。徐渭16岁时，萧鸣凤送侄子萧女臣至徐渭家读私塾，并介绍汪应轸(青湖)先生教徐渭作举业文。萧鸣凤对徐渭的教导虽然重在求取功名，但他的王学肯定对徐渭的思想产生影响。至于钱楩，徐渭年轻时曾受其影响而“有慕于道”，并自号“青藤道士”。徐渭亦把钱楩列入师类，云“钱翁楩，解嘉靖四年乙酉，五年丙戌成进士。与之处，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四间”。后钱楩也师事季本，转向阳明学。

徐渭以强调“真我”、“大我”为核心的真我说，可以说和其问学王门的学术路径存有必然的联系。在徐渭看来，文坛最大的积习在于重格调(名教)而轻风神(性灵)，拟古人而鲜自得(以前后七子为代表)。袁宏道所推崇的“性灵说”，和徐渭主张的“真我说”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这也是袁宏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徐文长的内在原因。这一派的学术源流，可以追溯至南北朝甚至更早的时期，比如在南朝钟嵘的《诗品》中，即突出诗歌可以“陶性灵，发幽思”，乃具“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等特性，强调“直寻”和“自然英旨”之美。刘勰云“性灵镕匠，文章奥府”、颜之推云“标举兴会，发引性灵”、萧子显云“图写性情，各任怀抱”、萧纲云“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等文学主张，都是言简意赅的精辟论述。但徐渭所说的“真我”，又不全然等同于比之晚生47年的袁宏道的“性灵说”，区别在于袁宏道乃着眼于生命个体之“独抒”，而徐渭的主张，乃着力于大化同一、物我同参、尽天地之广大的“大我”和“真我”境界，这本是阳明学说的要义之一，也是文学创作者本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徐渭在《赠成翁序》中说道：“予惟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夫真者，伪之反也。”一切伪善的道德说教、附阿时流和未从本怀、本心出发的写作模式，皆不入徐渭的法眼。他曾对这样的文风表示过蔑视，以为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

从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到性灵派的“不傍古人，期于自得”，包括“唐宋派”的肯定秦汉、尤其肯定太史公散文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于唐宋八大家的学习的主张，可以看出当时文坛的不同阵营既有交叉、又大异其趣的不同侧面。而徐渭的站位，虽强调心性自然，却并不等同于完全放任，而是在理法、规范之中有所设限，以为文学不可“设情以为之”(《徐渭集》)。师古与写情并非一对矛盾，因为“古人之诗本乎情”，但“情”必须是真情而非“设情”。由此可以看出，徐渭特别在意处，其心心念念者，无非“真我”一说。

众所周知，先秦两汉和唐宋时期，并称为中国散文最繁荣的两大时期。徐渭对于先秦诸子及唐宋大家之文，皆曾涉猎博览，但以师前人之神韵、收了无凿痕，以期达到师心自用、不傍门户为旨归，这与前后七子的价值取向显然不同；与后来的“性灵派”虽然同师王门，主张相近，却并不完全合流。以徐渭的狂放不羁、“不为儒缚”(《自为墓志铭》)及诗文之奇恣纵肆，倒和李贽之尖锐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可谓不分伯仲。至于他的大写意花鸟画和狂草，从某种程度上说，可看作是以跨门类的方式，与李贽的“狂禅”风格所达成的高度契合和笔墨表达。

徐渭一生，存世有全集三十卷，所涉样式较广，可概括为几类：一类为较为正式的表启(担任胡宗宪幕僚时所作)、策论序记等实用性很强的文种；另一类则为小品文(含尺牍题跋)，这部分作品很有特色，深得晋人风致及东坡神韵。其中，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还有戏剧、理论等方面作品。代表作有：《四声猿》，内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南词叙录》，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戏剧理论方面，徐渭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符合人物特征，以贴近人物的真实性。与之相应的，则应摈弃华丽的骈语和过度的修饰)；以及《徐文长佚稿》《歌代啸》《云合奇纵》(即《英烈传》，传为徐文长所作小说)。这些样式不同的文学创作，皆具独辟蹊径、奇崛放逸、机智多趣、不傍古人的个性面目。他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内心及对社会现实的直感，可谓求道盛唐而杂取南朝并出入宋元，却终不失自我独立的面目，为稍后主张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于改变晚明诗文之风，亦深具催化及示范之功。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曾有这样的评价：“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虽然说徐渭身前文名不彰，几近埋没，和明朝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及晚明清初的“竟陵派”、“桐城派”的令人瞩目、“天下咸奔走其门”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但徐渭的身谢而道隆，却绝非浪得一时虚名者所能比，故时人常把徐渭比作中国的梵高。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继而评价道：“(徐渭)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和同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新古文运动骨干、散文大家曾巩作比，认为徐渭不在他们之下，虽有溢美之处，却也是独抒己见的评价。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困厄重重，如其所言：“孤孽之苦，履历之难，偃蹇之状，骨肉煎逼，萁豆相燃”(《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还包括他个人婚姻的不幸。故而他的为文，是以现实人生为写照，“侘傺穷愁”、悲鸣自放乃其主要内容。到了晚年，他形单影只，老病缠身，瓶罄之状，可谓凄凉。但徐渭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艺术上，在当时人难以企及的全才领域，他就像一只从草丛里惊起的雀鸟，在经历了上升途中所有的压力测试之后，升向了身后的高空，并瞬即化为大鹏，翱翔于云端，令后世无数的仰望者为之惊叹，并在斑斓多姿的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徐渭在《水墨葡萄图》(故宫博物院藏)上自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抒发了一生坎坷不遇的痛苦悲怆。

学林

1949年常州恽家墩汉墓的考古发掘

贾鹏涛

唐星良先生等在《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上发表《江苏常州兰陵恽家墩汉墓发掘简报》，文中言：“恽家墩汉墓位于常州市兰陵迎宾路福海大饭店院内，为一座长逾50米、宽逾40米，高出地面6—7米的巨大土丘。因靠近附近的恽家村，因此得名‘恽家墩’。据资料记载和附近村民回忆，该土坑于1948年和‘文革’期间，遭到两次大规模的发掘破坏，出土大量釉陶器、印纹陶器及青铜器、铁器等，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摸清恽家墩的内部结构和剩余文物资源，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受常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常州博物馆于2007年12月24日至2008年4月17日对恽家墩汉墓进行发掘，共清理汉–六朝墓葬36座，明清墓葬4座。”出土随葬品292件，其中可修复者达179件。这段简报中未曾言的，是此墓被发现后，1949年上海市立博物馆和同济大学主持的常州恽家墩古墓考古发掘。为还原历史，笔者今据当时无锡《人报》、上海《新闻报》和《申报》、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将此次考古发掘细述如下。

杨宽

时间得拨回1948年底，当时国民党的一支军队为构筑城防工事，看中常州恽家墩的地势，刚掘一丈多深，忽然发现土里尽是砖块，于是被迫暂时停工。村民都去挖砖块，好像取之不尽。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在南门外发现一处几千年前的古墓，墓穴很深很大，里面有红木棺材，有宝剑大刀，还有金银财宝。1949年3月12日，城防工事再次开始，于是掘得古墓。就目前所看到的材料而言，无锡《人报》派记者最先实地探察，3月17日，以《满城风雨传古墓 常州发现怪窟》为题报道。文中详细讲述了勘察古墓的经过并纠正了一些谣传。3月18日，《新闻报》也报道了常州恽家墩发现古墓事，文言：

小南门外青龙桥附近有恽家墩，近因构筑城防工事，将此墩发掘，突发现古墓，土中有砖，已破碎。再往下掘，则露出完整者，每块重约七八公斤左右，砖尽掘出，忽现一半圆形之门，门外之土掘去，内尚有砖室，顶离土约五尺左右，两旁阔约七八尺，进深约五尺。砖上正面有钱形花纹，钱上有古体字。半圆形门公三，为鼎足式，其他二门为土塞没，不得入内。村民在墩中拾得古钱数枚，惜因年久锈生，大多破碎。另有钢刀之半段刀尖，长约八寸，阔一寸，甚锋利，已被人取去研究。城防部赵指挥官，十五日前往视察一过，为免破坏古迹，特派兵看守，十六日继续发掘，以待究竟。

3月20日，《申报》以《常州古墓奥秘初露 专家研究墓砖 断为三国遗物》为题详细报道。经过《人报》《新闻报》《申报》等多家媒体的连番关注，此事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3月23日，时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及艺术部主任蒋大沂特地前往常州查访。3月25日，杨宽与蒋大沂返回上海，并接受《申报》采访，认为此墓虽早已被盗过，但有发掘价值，据墓砖推测，最早朝代不越东汉之末，最迟至于西晋。

此事的媒体效应、考古工作者的实地探察，使得江苏省政府特别重视此事，于4月8日请上海市立博物馆与同济大学请领发掘执照，合作主持发掘。4月9日，常州县政府邀请上海市立博物馆杨宽、蒋大沂和南京中央博物馆的曾昭燏参加发掘常州古墓会议。4月14日，杨宽在致上海市教育局的函中详言会议表决的结果：

当经决议：(一)初步发掘工资，需米三十担，由武进县政府担任，惟发掘出土文物，应归武进县保存。(二)发掘工作由市博物馆及同济大学负责主持，并推定市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蒋大沂为发掘主持人。(三)研究工作及编造报告，由市博物馆及同济大学主持等。

4月15日，常州古墓工作团开始发掘。4月22日，《新闻报》以《常州南郊古墓继续挖掘》、《申报》以《常州南外古墓清理第一声》为题报道。因《申报》记录详细，录其中相关内容如下：

议既定，于是工作逐渐展开。凡事一着实际，就处处感到麻烦了。诸如田野工作者的场所、住处、伙食，以及工作，随在都经过了一番张罗和布置。最后，青龙桥小学校长王佩琴帮了忙。让出礼堂，做工作场所。乡长吕富昌帮了忙，找工人，借工具，以及搭篱笆。七七八八，着实烦了一阵子的准备工作。

十三日，杨有润先生清晨就赶到青龙桥，十四日同济蒋大沂率同了两位技术人员也赶到，彼此兴致冲冲，十五日正式开始清理。先着工友将古墓前的积土撤清，一锄头，一锄头，一担泥，一担泥的进行下，第一天把一个已被乡民因取砖而发掘净尽的墓基重新找出。长、阔、高等找到眉目。十七日下了一天春雨，就延滞了工作进程。十八九日两天，才挖到这个古墓底地。在琐碎的泥堆下，得了破烂的古钱。和粉碎的铁器，古钱大都是五铢钱。铜绿斑驳，有些还十分完整，有些事支离破碎，很难检收。铁器也剩着烂柯的样儿空无可磨洗，这些现在都被田野工作者，一一收拾保存起来了！这个古墓的周围，现已用竹篱笆围起来，并由城防部张贴布告，在工作期间，一律停止参观。至于墓内工作，岂笔者为文止，尚未进行，大约还须在一二日后，可以登堂入室。

当田野工作展开之际，蒋大沂和杨有润先生，在初发现古墓的北面约五六丈之远。也就是恽家墩的正上面，在城防工事挖出一个深坑的北面墙壁，露出砖砌一丛。蒋、杨两先生认为这里定有苗头。于是也分一二个工人，在这里发掘。大约开进去不到五六尺，就另发现了一个坑，坑内满满的挤着一个瓶，一个瓶，大大小小，六七个瓶露面了！目的物加强工作兴趣，六个瓶拿出来了，下面还有着瓶，七个八个，十余个，……十九日连着开到深夜二时余，开出了十余个，但实藏了还是不少的瓶儿。并且已发现了一部分铜器，为了工作谨慎起见，暂时停手，仍旧用板门掩起，上面仍用泥封起。二十日清晨，在这地也打一个竹篱笆起来，定二十一日再细细清理。蒋杨两先生以及地方人士，都十分兴奋，原来又掘得了另一个古墓。

古墓内完全是储满了明器，根据汉魏晋的古墓常例，往往墓内另有一室，专储器用。此室当为明器储藏室无疑。墓的砌砖上，没有花纹，与第一墓砖不同，由此亦可知，此必为两墓，不是一家。已出土的明器(二十日前)均为陶器，一个顶大的高约一尺五六寸，阔一尺二三寸。

图案式样极优美，上半截单色淡黄油彩，黑赭色线条，瓶口描叠人字纹，细腻均匀。瓶颈一束，亦为叠人字纹，瓶肩及身三道横弦线纹。上两空间带状中，描有飞鸟和鸣图案，古拙多趣。下半截色紫赭，无油釉。瓶肩有两攀。虎蹄脚。甚精细。瓶口一面缺碎，内满藏污泥。另为一巨形罐。高阔约为一尺二三存，取圆形味。上大半截均涂油釉，淡茶黄色。以重叠横线，横线之间，竖以小组纵线，上下错综，花纹亦古拙可爱。下半截无油釉，色如泥。此完好无缺，罐内都实泥土。另有小形罐八九个，形状与大罐相近，只小了些。罐身均有弦线纹相间横划。一种色泽全赭红色，一种色为赭酱色。大小亦略有不同。据非正式的说法，这类东西，总在六朝之间。出土的罐，统拿到县党部，一一保管，留待一并细细研究，现在似已感到研究工作人员太少了些。

由上可见，描述的内容非常细致，完全可当一份发掘报告。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战事紧迫，发掘工作未进行多久，便被迫中断。据参与其事的杨宽后来回忆：

四九年四月中旬，正当解放军准备横渡长江之际，驻防在常州的国民党军队在车站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发现了一个有铜器的汉墓，没有任何考古工作队前往发掘清理。我们认为义不容辞，应该前往完成发掘工作，抢救出这批汉代文物。我为了避开那些古董商趁上海附近战事爆发对我做什么小动作，就和蒋大沂一起带领一个考古队前往常州发掘汉墓，临行前，我托《大公报》记者发出消息，说我带领考古队前往常州一带从事考古发掘。当我们把这个汉墓发掘清理完毕，解放军已在二十一日横渡长江，很快就攻占常州。我们商量决定，由蒋大沂带领考古队留在常州，把这批出土汉墓汉代文物造册，在适当时候送交常州新成立的机构保管，我自己则先回上海，以便处理博物馆在战乱中遇到的问题。

上海解放后，成立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市政教育处”，戴白韬、舒文任正副处长，负责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所属的学校和单位，包括中小学，也有市属四所大专学校(师专、工专、体专和水专)和全部社会教育机关，包括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俱乐部、体育场所和补习学校。其中，胡就明任社会教育室副主任，具体负责接管社教单位。胡就明曾电话问及时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常州古墓发掘事，杨宽特写书信向胡就明报告情况，1949年6月27日信言：

至于此次在常州发掘的，是另一个六朝的坟墓，(地点在常州南门外恽家墩)，工作是和同济大学合作的。到解放为止，只掘了一个墓室，全墓的发掘并未完工。出土物已有六十余件，完全在常州军管会指导之下，寄存在常州，县立图书馆尚未运回。这批古物常州当地人主张将来在常州公开陈列的，我们和同济大学曾和他们订立合同，说明待全墓发掘完工，须运沪整理研究，编著发掘的学术报告，待研究工作完成，然后再运回常州陈列。这件事究竟如何处理，此后发掘工作何时继续，尚恳和常州军管会、文教部作一洽商。(见《杨宽书信集》，第32页)

杨宽信中希望将发掘出来的古物运回上海市立博物馆整理研究，待整理完成后再运回常州陈列，此事并未实现。1949年10月，陈纶担任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文管会接收的第一批文物就是常州恽家墩出土的汉明器组群。(吴雨苍：《陈谷岑先生和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 第12辑》，1985年，第56页)时隔59年后，常州恽家墩古墓才得到了完整的发掘。至此，常州古墓发掘事情宣告结束。

多年过去了，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由上海市立博物馆及同济大学主持的常州恽家墩古墓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我们不应遗忘。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系)